



二十世纪全纪录

周丽琼  
主编

1934

# 目 录

中国部分 .....	1
世纪回眸 .....	1
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 .....	1
中华苏维埃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 .....	8
蒋介石发起“新生活运动” .....	11
宋庆龄、何香凝等几千人签名力主抗日 .....	15
长征准备阶段 .....	15
长征失利阶段 .....	19
国民党围剿长征途中的红军 .....	23
长征：血染湘江 .....	24
临时中央六届五中全会 .....	25
中共中央批评肃反扩大化 .....	25
中华苏维埃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 .....	26
蒋介石镇压白区爱国民主运动 .....	27
方志敏牺牲 .....	27
红六军团突围西征 .....	32
红五军团 .....	32
中国工农红军陕北独立师 .....	32
中央苏区成立以项英为首的中央军委 .....	33
日本发表侵华宣言 .....	33
杨靖宇为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军军长兼政委 ...	34
红二十五军主力开始辟新的根据地 .....	34
程子华奉命到达鄂西北地区 .....	34
红四方面军粉碎四川军阀的六路围攻 .....	35
布置中央根据地的斗争 .....	35
中共代表团与统一战线问题 .....	36

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出征 .....	52
藏本英明事件 .....	53
毛泽东：我们不能去湘西钻口袋 .....	53
长征中毛泽东用兵如神 .....	57
吉鸿昌在北平就义 .....	61
学者刘半农逝世 .....	66
小资料.....	73
世界部分 .....	76
世纪回眸.....	76
共产国际就五次反围剿问题致电中共中央 .....	76
1934 年的第二届世界杯.....	77
《巴尔干协约国公约》 .....	81
美国通过菲律宾独立法案 .....	82
伊拉克共产党成立 .....	82
苏联和欧洲问题（1933 ~ 1934） .....	84
皮兰德娄获诺贝尔文学奖 .....	101
德国总统兴登堡去世 .....	102
小资料.....	112

## 中国部分

### 世纪回眸

#### 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在江西省南部、福建省西部地区，反击国民党军 50 万兵力“围剿”中央苏区的战役。

国民党军采取堡垒主义的新战略发起“围剿”，红军仓促应战。1933 年初，日军大举入侵华北，中华民族危机日益严重，然而国民党政府主席蒋介石却置民族危亡于不顾，仍然坚持推行“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方针，决心消灭共产党及其领导的红军。5 月，他在南昌设立全权处理赣、粤、闽、湘、鄂五省军政事宜的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南昌行营，亲自组织和指挥对各苏区进行更大规模的第五次“围剿”。并决定采取持久战和“堡垒主义”的新战略，同时对苏区实行经济、交通封锁，企图逐步压缩并摧毁苏区。是年夏秋，蒋介石一面向美、英、德、意等国大量借款，购置军火，聘请军事顾问和专家；一面在庐山召开军事会议，开办“剿匪”军官训练团，并着手制定“围剿”计划，加紧进行“围剿”准备。这次“围剿”，蒋介石调集 100 万兵力，其中，直接用于进攻中央苏区的兵力达 50 万人。其部署为：北路军总司令顾祝同，指挥第 1、第 2、第 3 路军，计 33 个师又 3 个旅。其第 1 路军 4 个

师又 2 个旅位于吉水、新淦(今新干)、永丰、乐安、宜黄地区；第 2 路军 6 个师位于金溪、腾桥、崇仁地区；以陈诚任总指挥的第 3 路军 18 个师又 1 个补充旅为此次“围剿”的主力军，集结于南城、南丰、临川地区。北路军的任务是：由北向南，构筑碉堡封锁线，实施对中央苏区的主攻。以第 3 路军在第 1、第 2 路军策应下，向广昌方向推进，寻求红军主力决战；由北路军总司令部直接指挥的 2 个师扼守赣江西岸的吉安、泰和等地，配合西路军维护赣江交通；总预备队 3 个师位于抚州(今临川)附近。南路军总司令陈济棠，指挥 11 个师又 1 个旅，筑碉扼守武平、安远、赣县、上犹地区，阻止红军向南机动，相机向筠门岭、会昌推进，配合北路军作战。西路军总司令何键所部 9 个师又 3 个旅，和浙赣闽边守军 5 个师又 4 个保安团分别“围剿”湘赣、湘鄂赣和闽浙赣苏区红军，并阻止红一方面军向赣江以西和赣东北机动。第 19 路军总指挥蔡廷锴指挥 6 个师又 2 个旅，负责福建防务，并阻止红军向东机动。空军 5 个队配置于南昌、临川、南城，支援作战。

中央苏区取得第四次反“围剿”胜利后，范围扩大到 30 多个县；政权建设和经济建设都取得很大成绩；主力红军扩大到约 10 万人；地方部队和群众武装亦有很大发展。但面对国民党军采取堡垒主义新战略和重兵进攻，也存在不少困难。而中共临时中央领导人博古(秦邦宪)等却认为，这次反“围剿”战争是争取中国革命完全胜利的阶级决战。在军事战略上，拒绝和排斥红军历次反“围剿”的正确战略方针和作战原则，继续实行“左”倾冒险主义的战略指导，提出“御敌于国门之外”的方针，企图以阵地战、正规战在苏区外制敌，保守苏区每一寸土地。这

时，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李德（又名华夫，原名奥托·布劳恩，德国共产党党员）从上海到达中央苏区，直接掌握第五次反“围剿”的军事指挥权。因而，在国民党军“围剿”前夕，未及时有效地组织苏区军民进行反“围剿”准备，而是命令由红3军团、红19师为主组成的东方军和由红1军团、红14师为主组成的中央军，继续在闽西北地区和抚河与赣江之间地区对国民党军实行不停顿的进攻。红一方面军主力在持续作战而未休整和补充的情况下，即于9月下旬仓促开赴中央苏区北线迎击国民党“围剿”军。

红军在北线受挫，放弃决战计划9月25日，完成“围剿”准备的北路军，以3个师的兵力由南城、硝石向黎川发起进攻。东方军奉命由福建省将乐、顺昌北上，拟首先消灭进逼黎川之国民党军，进而与敌在抚河会战。28日国民党军占领黎川。中革军委为恢复黎川，再令东方军以一部阻止黎川国民党军南进，主力进攻硝石、资溪桥、黎川；令中央军由永丰、乐安地区东移，攻击和牵制南城、南丰地区的国民党军主力，以保障东方军收复黎川。10月6日，东方军在向硝石前进途中，于洵口、飞鸢与由黎川前出侦察之国民党军3个团遭遇，将其大部歼灭后，于9日进攻硝石。国民党军依托坚固堡垒据守，东方军攻坚数日不克，伤亡严重。中央军主力阻止南城援军也未达目的。13日，“围剿”军4个师进抵硝石，东方军被迫撤出战斗。17日，蒋介石命令“围剿”军继续构筑绵密的碉堡封锁线，稳扎稳打，逐步推进。18日，驻南城4个师由硝石进到潭头市，其先头和黎川之3个师又1个旅进占资溪桥。在此情况下，中革军委仍令红一方面军主力插入国民党军堡垒密集地区实施强攻。22

日，红军以 3 个师攻击资溪桥和潭头市，主力集结于石峡、洵口、湖坊地区，准备突击被牵动之敌。国民党军据碉坚守，红军连攻 4 天未克。28 日，中革军委决定组建红 7、红 9 军团。此后，中革军委又令红 7 军团伸入抚州附近地区活动，企图调动金溪及南城、南丰之国民党军。11 月 11 日，红 7 军团向浒湾进攻时，在八角亭附近遭到由金溪县城、琅琚和浒湾出击之国民党军的夹击。红 3 军团驰援，在八角亭东南受阻，12 日向敌阵地攻击，遭受重大伤亡，被迫撤出战斗。红 7 军团也在阵地被突破后撤退。15~17 日，奉命由荐源桥至棠阴的国民党军堡垒线间隙北出作战的红军中央军主力，在云盖山、大雄关遭“围剿”军 5 个师的攻击，伤亡严重，被迫向苏区内转移。至此，红军虽经近 2 个月浴血苦战，却未能御敌于苏区之外，反使部队遭受很大损失，完全陷于被动地位。

红军转入阵地防御，与国民党军进行消耗战红军在北线进攻受挫后，中共临时中央转而采取消极防御的战略，要求红军处处设防，节节抵御，以制止国民党军的“围剿”。此时，驻福建省的国民党军第 19 路军于 11 月 20 日发动了反蒋介石的福建事变，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蒋介石慌忙从北路军中抽调 11 个师前往镇压。此时，毛泽东提议，红军主力应突进到以浙江为中心的苏浙皖赣地区，纵横驰骋于杭州、苏州、南京、芜湖、南昌、福州之间，将战略防御转变为战略进攻，威胁敌之根本重地，向广大无堡垒地带寻求作战。而中共临时中央却将红军主力从东线调到西线永丰地区，进攻国民党军的堡垒阵地，从而使红军丧失了打破“围剿”的有利时机。12 月 11 日，蒋介石为保障其进攻第 19 路军的翼侧安全，以第 8 纵队 3 个师从黎川向团村、东山、德胜

关推进。12日,该纵队2个师向团村附近红5军团阵地发起攻击。红一方面军急调红3军团、红3、红34师,从东、西两个方向反击。但因兵力不集中,仅击溃其一部,未能大量歼敌。蒋介石在镇压了福建事变以后,即将入闽部队改编为东路军,协同北路军、南路军,于1934年1月下旬重新开始了对中央苏区的进攻。主力从东、北两个主要方向采取堡垒攻势,向广昌方向进攻,其第3路军主力向建宁推进,第6路军2个纵队从永丰向沙溪、龙冈推进。

在国民党军新的进攻面前,中共临时中央仍然要求中央红军(1934年1月由红一方面军改称)处处设防,广筑碉堡,以阵地防御结合“短促突击”顶住敌人的进攻。从1月下旬开始,红军全线开展阵地防御战。在赣东方向,国民党军北路军4个师夺取建宁,分两路进攻黎川、建宁间要点横村和樟村,突破红5军团防御后,再攻邱家隘、坪寮,红9军团和红3军团第4师抵御失利,被迫南撤。2月9日,红1、红9军团分别在樟村以西鸡公山及熊家寨与国民党军各1个师激战,失利后被迫南撤。15日,红1、红9军团、红3军团第4师、红5军团分别在凤翔峰、司令岩、芦坑与国民党军3个师激战,均未获胜。25日开始,红1军团等部为保卫建宁,在建宁西北山岬嶂与国民党军激战3天,击溃其1个师。3月上中旬,中央红军与国民党军北路军频繁交战,红军节节失利,损失严重,逐步向广昌撤退。至此,北路军完成了乐安至黎川的堡垒封锁线,开始准备进攻广昌。在闽西北方向,2月24日~3月下旬,红7军团等部先后在沙县、将乐、泰宁、归化(今明溪)等地区与国民党东路军展开激战,失利后被迫向西退守建宁、宁化一线。国民党军东

路军亦筑碉步步进逼,向建宁推进,并与北路军第3路军在闽赣边界的德胜关会师。各路“围剿”军的合围紧逼,迫使中央红军主力在广昌、建宁等地与之决战。

4月上旬,国民党军北路军和东路军进到南丰县的康都、西城桥至泰宁一线,并集中11个师分两个纵队沿盱江两岸向广昌进攻。中共中央在红军连续作战、十分疲劳、减员很大的情况下,以红1、红3、红9军团及红5军团第13、第23师共9个师的兵力,采取集中对集中、堡垒对堡垒、阵地对阵地的“正规战”,以求阻止国民党军进占广昌。10日开始,国民党军7个师又1个炮兵旅,在大批飞机的配合下,向广昌交替攻击。红军辗转苦战,难于应付。14日,甘竹失守。19日,大罗山、延福嶂阵地丢失,红军反击未能奏效。至下旬,红军被逼至广昌城下。27日,国民党军向广昌城发起总攻,红军拼力抵抗,并组织反击,但未能阻止国民党军的连续攻击。28日,红军退出广昌。

4月下旬~5月中旬,国民党军东路军加紧进逼建宁,相继占领太阳嶂、将军殿、弋口、挽舟岭、江家店。16日,东路军在北路军和空军配合下攻占建宁。南路军于5月上旬占领筠门岭要塞。6~7月间,红军在古龙冈以北地区进行了反击作战,均未能阻止国民党军的进攻。苏区范围逐渐缩小。

红军6路分兵抵御失利,被迫实行战略转移蒋介石为了加紧对中央苏区中心地区的“围剿”,重新调整部署,于7月上旬开始全面进攻。此时,中革军委以红7军团组成的北上抗日先遣队,从江西省瑞金出发,经福建省向闽浙皖赣边挺进。但此举亦未能牵动国民党“围剿”军回援和减轻对中央苏区的压力。这时,中央苏区的人力、

物力都很匮乏，红军已失去了在内线打破国民党军“围剿”的可能。在此情况下，中共中央采取了6路分兵、全线抵御的方针，将红军主力分别配置在兴国、古龙冈、头陂、驿前、连城、筠门岭等地区，继续同国民党军拼消耗。

8月5日，北路军9个师在空军、炮兵的支援下，向驿前以北地区发起攻击。红3军团和红5军团第34师奉命在高虎脑、万年亭到驿前约15公里纵深内，实施阵地防御。至月底，击退国民党军多次集团冲击，使其第89师丧失了战斗力。但红军也伤亡严重，不得不放弃驿前以北的全部阵地。8月底9月初，红1、红9军团等部虽在温坊（今文坊）地区伏击、袭击离开堡垒之国民党军，歼灭东路军1个多旅，却未能改变红军的被动局面。下旬，中央苏区仅存瑞金、会昌、雩都（今于都）、兴国、宁都、石城、宁化、长汀等县的狭小地区。21日，中革军委决定，组建红8军团。10月上旬，北路军和东路军加紧对兴国、古龙冈、石城、长汀的进攻，南路军由筠门岭向会昌推进，企图迅速占领上述各地，进而占领宁都、雩都、瑞金，以实现围歼红军的目的是。这时，中共中央主要领导人决定，放弃中央苏区。10月7日，中革军委下令地方部队接替各线防御任务，主力红军撤到瑞金、雩都、会昌地区集中。10日，中共中央、中革军委从瑞金出发，率领主力红1、红3、红5、红8、红9军团和中央、军委直属队共8.6万余人，开始向湘西实行战略转移。

此次反“围剿”，持续1年之久，中央苏区军民全力以赴，为保卫苏区，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付出了巨大代价，给予国民党军大量杀伤。但由于中共中央实行错误的军事战略和作战原则，使这次反“围剿”作战始终处于

被动，以致在红军遭到严重削弱、中央苏区大部丧失的情况下，被迫进行长征。

## 中华苏维埃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

1934年1月22日至2月1日中华苏维埃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江西瑞金沙洲坝开幕。

出席大会的正式代表693人，候补代表83人。大会听取并讨论了毛泽东作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对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的报告、朱德的红军建设报告、林伯渠的经济建设报告、吴亮平的苏维埃建设报告和项英的宪法报告，通过了关于国徽、国旗、军旗的决定以及修正的宪法大纲等重要决议案。

中华苏维埃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谨向全世界全中国的劳动群众，宣布它在中国所要实现的基本任务，即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宪法大纲。这些任务，在现在的苏维埃区域内已经开始实现。但中华苏维埃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认为，这些任务的完成，只有在打倒帝国主义、国民党在中国的统治，在全中国建立苏维埃共和国的统治之后。而且在那时，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宪法大纲才能更具体化，而成为详细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宪法。中华苏维埃全国代表大会谨号召全中国的工农劳动群众，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中央政府的指导之下，为这些基本任务在全中国的实现而斗争。

（一）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基本法（宪法）的任务，在于保证苏维埃区域工农民主专政的政权和达到它在全中国的胜利。这个专政的目的，是在消灭一切封建残余，赶走帝国主义列强在华的势力，统一中国，有系统的限

制资本主义的发展，进行苏维埃的经济建设，提高无产阶级的团结力与觉悟程度，团结广大贫农群众在它的周围，同中农巩固的联合，以转变到无产阶级的专政。

（二）中华苏维埃所建设的，是工人和农民的民主专政国家。苏维埃政权是属于工人、农民、红色战士及一切劳苦民众的，在苏维埃政权下，所有工人、农民、红色战士及一切劳苦民众都有权选派代表掌握政权的管理，只有军阀、官僚、地主、豪绅、资本家、富农、僧侣及一切剥削人和反革命分子是没有选举代表参加政权和政治上自由的权利的。

（三）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之最高政权为全国工农兵苏维埃代表大会，在大会闭会的期间，全国苏维埃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为最高政权机关，在中央执行委员会下组织人民委员会，处理日常政务，发布一切法令和决议案。

（四）在苏维埃政权领域内，工人、农民、红色战士及一切劳苦民众和他们的家属，不分男女、种族（汉、满、蒙、回、藏、苗、黎和在中国的台湾、高丽、安南人等）宗教，在苏维埃法律前一律平等，皆为苏维埃共和国的公民。为使工农兵劳苦民众真正掌握着自己的政权，苏维埃选举法特规定：凡上属苏维埃公民，在十六岁以上者皆有苏维埃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直接派代表参加各级工农兵苏维埃的大会，讨论和决定一切国家的地方的政治任务。代表产生方法，是以产业工人的工厂和手工业工人、农民、城市贫民所居住的区域为选举单位；这种基本单位选出的苏维埃代表有一定的任期，参加城市或乡村苏维埃各种组织和委员会中的工作；这种代表须按期向其选举人做报告，选举人无论何时皆有撤回被

选举人及重新选举代表的权利；为着只有无产阶级才能领导广大的农民与劳苦民众走向社会主义，中华苏维埃政权在选举时，给予无产阶级以特别的权利，增加无产阶级代表的比例名额。

（五）中华苏维埃政权以彻底改善工人阶级的生活状况为目的，制定劳动法，宣布八小时工作制，规定最低限度的工资标准，创立社会保险制度与国家的失业津贴，并宣布工人有监督生产之权。

（六）中华苏维埃政权以消灭封建剥削及彻底的改善农民生活为目的，颁布土地法，主张没收一切地主阶级的土地，分配给雇农、贫农、中农，并以实现土地国有为目的。

（七）中华苏维埃政权以保障工农利益，限制资本主义的发展，使劳动群众脱离资本主义的剥削，走向社会主义制度去为目的，宣布取消一切反革命统治时代的苛捐杂税，征收统一的累进税，严厉镇压一切中外资本家的怠工和破坏阴谋，采取一切有利于工农群众并为工农群众所了解的走向社会主义去的经济政策。

（八）中华苏维埃政权以彻底地将中国从帝国主义压榨之下解放出来为目的，宣布中国民族的完全自由与独立，不承认帝国主义在华的政治上、经济上的一切特权，宣布一切与反革命政府订立的不平等条约无效，否认反革命政府的一切外债。在苏维埃领域内，帝国主义的海、陆、空军不容许驻扎，帝国主义的租界、租界地无条件地收回，帝国主义手中的银行、海关、铁路、商业、矿山、工厂等，一律收回国有，在目前可允许外国企业重新订立租借条约继续生产，但必须遵守苏维埃政府的一切法令。

.....

(一一)中华苏维埃政权以保证工农劳苦民众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的自由为目的，反对地主资产阶级的民主，主张工人农民的民主，打破地主资产阶级的经济和政治的权利，以除去反动社会束缚劳动者和农民自由的一切障碍，并用群众政权的力量，取得印刷机关（报馆、印刷所等）、开会场所及一切必要的设备，给予工农劳苦民众，以保障他们取得这些自由的物质基础；同时反革命的一切宣传和活动，一切剥削者的政治自由，在苏维埃政权下都绝对禁止。

.....

(一三)中华苏维埃政权以保证工农劳苦民众有真正的信教自由的实际为目的，绝对实行政教分离的原则。一切宗教，不能得到苏维埃国家的任何保护和供给费用。一切苏维埃公民有反宗教宣传之自由，帝国主义的教会只有在服从苏维埃法律时才能允许其存在。

此届会议中选举毛泽东、陈绍禹、张闻天等 175 人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罗荣桓等 36 人为候补执行委员，董必武等 35 人为中央工农检查委员会委员。2 月 3 日，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举行第一次会议，选举毛泽东等 17 人组成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并以毛泽东为主席，项英、张国焘为副主席；选举张闻天为人民委员会主席，朱德为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周恩来、王稼祥为副主席。

## 蒋介石发起“新生活运动”

1934 年 2 月 19 日，蒋介石在南昌行营扩大纪念周

上讲演《新生活运动之要义》，发起新生活运动。他说，“我现在所提倡的新生活运动，就是要使全国国民军事化。”提出要以孔孟的“四维”（礼义廉耻）、“八德”（忠孝仁爱信义和平）为道德标准，统一人们的思想。

2月21日，南昌新生活运动促进会成立。

2月23日，蒋介石在南昌再次讲演，主张从改造国民的“食衣住行”等日常生活入手，以“整齐、清洁、简单、朴素、迅速、确实”为具体标准，以使“国民生活军事化、生产化、艺术化”，“改造社会、复兴国家”。其后，蒋多次演讲，并被编成《言论集》广为印发。希望把一场声势浩大的“新生活运动”推向全国。

宋美龄在推开“新生活运动”中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宋美龄和蒋介石结婚6年之后，首次投入的一场大规模运动，即旨在改造社会道德与国民精神的“新生活运动”。国民党于三十年代所推出的这场“精神方面的重大战争”（蒋介石语），也是该党建党以来所从事的一次最大规模之文宣工作。宋美龄在运动的推行和宣传上扮演了“火车头”的重要角色。

新生活运动的源起，说法不一，有些人认为是蒋介石为贯彻“七分政治、三分军事”的理念，乃推动新生活运动。有的则说蒋氏夫妇决心铲除贪污、受贿、不卫生和无礼貌，因而发起了“新生活运动”。也有人说宋美龄乃是新生活运动的源头活水。1933年盛夏，宋美龄在庐山牯岭避暑时，与一批美国传教士讨论中国情势。传教士说，南京政府如欲获得外国政府的支持和贷款，则蒋介石政府必须在国内实施社会福利计划，使外国政府和旅华对外人对蒋政权有好印象。传教士又说，美国罗斯福总统正推行“新政”，蒋介石何妨也实施改造中国

社会福利方面的“新政”。聪明的宋美龄马上领悟到传教士所说的重点，立即向蒋报告，蒋迅速同意其观点。宋即和传教士研究拟了中国“新政”的细节，她为这项计划取名为“新生活运动”

1934年2月19日，蒋介石在南昌行营举行的扩大总理纪念周上，发表“新生活运动之要义”演讲，宣布“新生活运动”开始。随着蒋介石的宣布，“新生活运动”促进会于南昌成立，蒋自任会长，7月1日改组为“新生活运动促进总会”，宋美龄则为妇女委员会指导长，并成为新生活运动的实际推动者和倡导人。新生活运动是要改造全民的生活，而妇女是家庭的中心，宋美龄乃大力鼓吹妇女为改造家庭生活的原动力，她向全国女性呼吁：“知识较高的妇女，应当去指导她们的邻舍，如何管教儿女，如何处理家务，并教导四周的妇女读书识字。”但她也承认：“中国的妇女，非但多数没有受教育的机会，而且大半还仍过着数百年前的陈旧生活。”

宋美龄推行“新生活运动”（当时简称为‘新运’）是不遗余力的，开会、撰文、宣传、演讲、督导和接受国内外媒体访问，忙得不可开交，但也满足了她的成就感。事实上，“新生活运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乃是美国基督教会的参与，但为了显示这是一项“纯中国人的运动”，教会的色彩也就被刻意冲淡。

抗战爆发后，“新生活运动”很自然地演变为战地服务、伤兵慰问、难民救济、保育童婴、空袭救难、征集物品和捐款等等与战时支援有关的活动。雷厉风行推动的“新生活运动”，经过3年多的时间已呈后继之势。

过度宣传最容易导致形式主义的出现，“新生活运

动”期间所产生的许多笑话和虚伪作假的乡愿风气，殆成为“新生活运动”的最大败笔。一向同情宋家姊妹的美国作家项美丽说，“新生活运动”后来变成了全国性的一场不大不小的笑话。中国近代外交家顾维钧的第三任妻子黄蕙兰在其回忆录中说，中国驻外人员常有外遇而导致婚变，故在抗战前外交界即戏称新生活运动(New Life Movement)为“新妻子运动”(New Wife Movement)。

冯玉祥将军批评说：“这十几年来，年年到了新生活纪念日都要开会的，有好多次找我去讲话。其实，新生活是说着骗人的，比如新生活不准打牌，但只有听见说蒋介石来了，才把麻将牌收到抽屉里，表示出一种很守规矩的样子；听见说蒋介石走了，马上就打起麻将来，24圈卫生麻将的、推牌九的、押宝的也都是这个样子。又如新生活不准大吃大喝，普通人吃一桌饭只花8块钱，蒋介石左右的大官吃一桌饭约60元，总是燕窝席、鱼翅席。不但大官是这样奢侈，大官的女人、奴才也是这样。……要是这些违反所谓新生活的故事，若是发生在离蒋介石远的小官身上，蒋介石也可以装不知道，而这些事都是发生在离蒋介石很近的文武大官身上，这还能装不知道吗？”冯玉祥又说：“……那些书的名字，什么新生活与军事、新生活与政治、新生活与这个与那个，几十个名堂，事实证明是什么？政治是腐败的，军事是无能到极点，经济是贪污到极点，文化是摧毁到极点。实行新生活会有这个样子？”

宋美龄把推广“新生活运动”当作其政治事业来看待，试图使国人在生活习惯和精神上“脱胎换骨”，不要让西方人“看不起我们”，并藉此让国人知道蒋夫人